

羅聯添編

國學論文選集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羅聯添編

國學論文選集

臺灣學書局印行

國學論文選集

羅聯添編

前言

講授國學課程有年，然於四部要籍，含英咀華，啓導學者，常恨力有未逮。而目前所見國學專書，大多過於繁難，淺顯扼要，適合於施教者，甚不易得。因欲集思廣益，選錄近今各家有關國學論著，彙爲一書，提供學者參考。

今年春以編印事就商於學生書局諸執事先生。承其同意出版，遂着手選錄。歷時三月，初選得論文五十餘篇，再選去其大同小異者，得三十三篇。

所見有限或偏於主觀，難免遺漏佳作或去取未盡妥當。求全責善，容後續編。

本書各篇論文作者多爲當今學界碩彥。以匆促付梓，未能事先一一徵得同意，甚以爲歉。其鴻篇卓論足以啓導後學，嘉惠讀者，入此選集，諒荷贊許。

戴君景賢、張君蓓蓓、王君小琳，爲本書悉心校閱；戴君復襄助編選。此書得以完成問世，三君功不可沒，特識於此。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羅聯添識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第一研究室

凡 例

- 一、本書選錄近今學者所撰有關中國四部之學論文三十三篇。首篇總論，第二篇以下爲專著。專著篇次大致按經、史、子、集排列。
- 二、所選論文以能深入淺出、啓發心智、有助於瞭解中國文化者爲主。一般論述有益於博聞者亦酌予選錄。
- 三、本書論文，大多照原文鈔錄。若有刪節，則於刪節處加以注明。
- 四、本書論文或原有魯魚之誤暨脫落文字。如係引文誤脫，則查原書予以訂補，如係作者行文誤植，明顯可見者，逕予訂正；不能斷定者，一仍其舊。
- 五、本書論文皆選自各家專書。論文篇末注明所出專書名稱，及專書出版年月、機構，以便查考。

國學論文選集

羅聯添編

目次

前言

凡例

一、四部概論·····

錢 穆·····一一—五二

經 學

二、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

錢 穆·····五三—七七

三、儒家精神與道德宗教·····

蔡仁厚·····七八—九〇

四、孔門之禮樂與祭祀·····

羅聯銘·····九一—一〇〇

五、中國倫理的基本精神·····

吳 森·····一〇一—一一〇

六、禮的轉變與擴大·····

戴君仁·····一一—一一八

史學

七、春秋在羣經中的地位·····	戴君仁·····	一一九—一二六
八、孝道·····	朱炎·····	一二七—一三六
九、經今古文學·····	周予同·····	一三七—一七五
十、中國史學思想的概述·····	呂謙舉·····	一七七—二〇三
一一、經學與史學·····	錢穆·····	二〇四—二二二
一二、中國歷史上的道德精神·····	錢穆·····	二二三—二三七
一三、中國歷史上的地理與人物·····	錢穆·····	二三八—二五三
一四、中國之人格世界·····	唐君毅·····	二五四—二八一

子學

一五、中國人的思想總綱·····	錢穆·····	二八三—三〇三
一六、中國人的文化結構·····	錢穆·····	三〇四—三二三
一七、孔子以後之中國學術文化·····	唐君毅·····	三二四—三三四
一八、儒道二家學說之境界·····	羅聯銘·····	三三五—三三九
一九、莊子的思想·····	黃錦鉉·····	三四〇—三六二
二〇、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	錢穆·····	三六三—三七〇

集部之學

二一、禪宗的思想……………	巴壺天……………	三七一—三八四
二二、宋明理學之總評覽……………	錢穆……………	三八五—三九三
二三、理學與藝術……………	錢穆……………	三九四—四二二
二四、朱子學術述評……………	錢穆……………	四二三—四四七
二五、陽明學說之淵源及其影響……………	蔣夢麟……………	四四八—四六六
二六、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	錢穆……………	四六七—四七七
二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文學……………	錢穆……………	四七九—四九四
二八、中國文學精神……………	唐君毅……………	四九五—五二六
二九、中國藝術精神……………	唐君毅……………	五二七—五四五
三〇、中國藝術理想……………	方東美……………	五四六—五七二
三一、中國散文……………	錢穆……………	五七三—五八三
三二、談詩……………	錢穆……………	五八四—六〇二
三三、詞曲的特質……………	鄭騫……………	六〇三—六一〇

一 四部概論

錢 穆

一、經 學

一
經學向認為是中國學術中最古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但經學只指對於中國古代相傳幾部經書之特有研究而言。

中國古代經籍，最先分爲詩、書、禮、易、春秋五種，謂之五經。其實此五經之結集時代並不早，或當在秦末漢初之際。

漢人又稱六經爲六藝，而漢代並不會有樂之一經，則六經六藝之名只是虛設。

五經以後，又有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彙集。此下中國經書則只限此十三種，並無再有增添。但所謂經學，則確然成爲中國各項學問中之最重要者，並可稱爲是中國學問之主要中心。

近代中國人開始和西方學術相接觸，遂對中國傳統中經學一部門發生了懷疑。或認為經學只是幾部經書之結集，若把近代西方學術分類眼光加以分析，詩經應屬文學，尚書、春秋應屬史學，易經應屬哲學，儀禮是一部記載有關古代社會風俗的書，應屬史學與社會學範圍。把中國古代五經如是分析了，便不該再有所謂經學之獨立存在。

惟就中國以往學術傳統言，我們仍不能否認在中國已往學術史上確有一種經學之存在。我們應本中國已往學術傳統來說明中國經學之實際內容，及發揮其何以在中國學術傳統上有其重要地位之意義所在。至於此後中國學術界是否仍有此一項經學之存在，此屬另一問題，我們應先能解答了上一問題，乃可繼續討論一下問題。

我認為，中國傳統學術有幾項特殊的側重點，此乃與中國文化傳統之特殊精神所在，有甚深密之關係，應先指出。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人文精神為中心。遠在殷商時代，中國人對天或上帝的信仰，本極重要。此乃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與其他民族實無大異。但到周初開國，周公把以前的宗教信仰移轉重心落實到人生實務上來，主要是在政治運用上。周公認為天心只隨人心而轉移。而文學最是喚發人心溝通人心的一個主要工具，因此詩經遂成為周公治國平天下的一部大經典。周公制禮作樂的一切大綱目，都表現在詩經裏。其次乃是尚書西周書中的大部分，都是有關當時實際政治的，尤其在誥令方面，都是有關政治思想與理論方面的。因此經學中詩和書兩種，都保留着周公當時許多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張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當時的種種思想和實際措施，加以一番極深密的探討和發揮，

而完成了一種純學術性的組織圓密的思想體系，此下纔有所謂中國的儒家。

我們也可以說，周公開始把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轉移運用到政治場合中來，而周公之政治運用又是極富教育意味的。孔子則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顛倒過來，想根據理想的教育來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後，周公與孔子兩人，大體上仍保留着古代相傳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層即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

中國後代人認爲六經始於周公而成於孔子，羣奉六經爲一種主要典籍，認爲六經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經實應以詩書爲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經學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實務，而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則愈後愈薄了。

二、其次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歷史精神的。既是看重了一切人文社會的實際措施，自然必會看重歷史經驗。因社會人文是在歷史演變中完成，又須歷史經驗來作指導。

周公是一個有實際成效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孔子作春秋，成爲中國第一部最有系統而又寓有甚深哲理的歷史書，此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即此可見中國經學裏歷史一項所佔分量之重大。所以中國此下經史之學是密切相通的。

尚書固然保留了當時許多歷史文件，但詩經中所包有的當時許多的歷史情實，更較書經爲豐富。詩經可謂是中國古代一部史詩。因其詩中大部分內容，實即是歷史。至於春秋，則顯然是有意於一種正式的歷史編纂了。儀禮所載，是當時社會一切禮俗，亦得目爲是一部歷史書。惟其成書時代則尚在孔子之後。如此說來，五經中四經全可說其是歷史。只有易經，最早本不爲儒家所傳習，尤其是經中之十傳部份，都完成在孔子之後，更應在戰國晚年，其

中融會入許多道家陰陽家思想，顯然與上四種不同。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國人總想把自然律則和人文措施相融會合，這是中國傳統理想中所謂的天人合一。易經一書，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來探討自然與人文之相通律則的。因此易經也為後人重視而被列為經書之一了。

三、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國古人並不會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寧是看重其相互關係，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總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究。在中國學者看來，上述諸經書，常不認其是應該各自獨立的。

四、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中國古人看重由學來造成人，更看重過由人來造成學。因此，在中國學術傳統下，看重每一個學者，更甚於其看重每一項學問。中國古語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我們僅把經學當做一種學問來看，此一學者易近於一經師，即為某一項學問之師。若我們把經學當做一種作育人的學問來看，此一學者易近為人師，即是可以為人人之師了。

因此，中國人研究經學，其最高嚮往，實在周公與孔子其人。周公成為一大政治家，孔子成為一大教育家。中國人認為只有會通綜合以上諸經而加以研究，纔能瞭解周公孔子之為人及其在歷史上之貢獻與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對人文社會與歷史演進之實際貢獻。中國人愛說通經致用，或說明體達用。中國人看重經學，認為經學的偉大，其理想即在此。即由學問來完成一個人，再由

此人來貢獻於社會。所貢獻的主要事業對象則為政治與教育。此等理想人格之最高境界，便是中國自古相傳所謂聖人。

因此，經學在中國，一向看為是一種做人之學，一種成聖之學。

要做一理想人，要做一聖人，便該在實際人生社會中去做，此便是中國學術傳統中之人文精神。要接受此種人文精神，必該通歷史，又該兼有一種近似宗教的精神，即所謂天人合一的信仰。必該博聞多識，對一切自然界人生界的知識能貫通合一，而從此尋求出一套當前可以活用的學問來真實貢獻於社會。此是中國經學所理想追求之大目標。

二

中國經學應自儒家興起後纔開始。直到西漢初年，經學傳統始正式成立。

西漢的經學家，最先本多兼通五經。到漢宣帝以後，漸漸走上專治一經之路，當時所謂今文博士是如此的，東漢古文經學興起，又再回到兼通諸經的路上去。

兩漢經學，主要在求政治上應用。

一、當時的政治理論，不依託在神權或君權上，而別有一套合於人文社會歷史演進的大理論。此套理論，皆從古代經書中推衍出來，即是從周公孔子的教訓中推衍出來。

二、政治措施不倚重在當朝之法律，或帝王宰相大臣等之私人意見，而必根據在古經書中推衍出來的理論上作決奪。

此在漢代歷史中皆有實例可舉，此乃經學在兩漢時代之大貢獻。中國歷史上文治政府的

傳統，即在兩漢時代奠其基。

學經學的當時稱儒，史記兩漢書儒林傳中人物，顯然與貨殖、游俠乃至文苑、獨行等傳中人物不同。儒林人物亦可謂是此下中國學人之標準模範。因此以下中國歷史人物乃至學者，必以儒爲正統，亦以從政爲主要目標。

但兩漢經學主要精神，比較偏重在政治。

當時稱孔子爲素王，又稱其爲漢制法，此因大一統局面初成立，王權驟張，一輩儒生乃高抬孔子與經學把來壓在新王權之上，漸漸形成此下歷史上一個能接受學術指導的政權，這是漢儒的功績。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根據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分類，以六藝與諸子分列，而儒家則列在諸子之首，但孔子不列爲儒家。孔子的論語，則附在六藝略，小學階段則讀孝經論語，大學階段則治五經。此乃由政府規定之學制。可見孔子在當時，乃亦有兩重地位，一則下開儒家，又一則上承周公傳統。六藝乃王官之學，儒家則只是百家之言。漢儒必把孔子與周公並舉，必把五經尊爲王官學，此是當時人之經學精神。

魏晉南北朝儒學中衰，但此下十三經注疏中之大部分工作，實在此時期完成。

當時上層政治規模，大體還承兩漢，下面門第傳統，也由儒家經學中之禮法來維持。但道家與佛教思想盛行，幾與儒家三分鼎立。經學上義疏之學，也與當時佛教中人解釋佛教經典的工作有關係。

唐代統一，把南北朝時代各家義疏集合起來，勒成五經正義，用作政府考試標準。但唐

代考試門類中更受重視的却是詩賦文學，而當時人對於人生哲理及教訓，則更偏向於佛學。

因此，唐代經學，依然是在衰微時代，並可說更比不上魏晉南北朝。

但唐代政治光昌，則較之南北朝爲遠勝，並可媲美兩漢。討論政治，則必依經學，因此經學在唐代人心目中，仍不失其重要性。

但此時的政治與人生未免漸分成兩途。從事政治事業，在人生理想中只認爲是次要者，若論人生最高嚮往及其終極理想，則不在孔子與五經，而必從佛教經典中去探求。直待宋代，始有新儒學興起。

宋代新儒學之主要目標，在於重新發揚古代儒家之人生理想，俾其再與政治理想通會一貫，把孔子教理來排斥釋迦教理。

既有新儒學，因亦要求有新經學。

宋儒努力作新經學運動者，在北宋主要有王安石，在南宋主要有朱熹。此兩人可爲宋代從事復興新經學運動之代表。

王安石所努力者，先把唐代政府的考試制度側重詩賦文學方面者，重新挽轉，把重心再移到經學方面來。

王安石又想把六朝以下經學義疏簡單化，他只學詩、書、周官三經，作爲新注，當時稱三經新義，亦稱王氏新學。

但王氏新經學之內容，並不爲當時一輩新儒家所滿意。因其於古代儒家所揭舉之人生最高真理闡發尙少，如是則仍不能與佛學相爭衡，於是乃有關洛理學家出現。

但北宋理學家雖能創出一套新的理學來，以與佛學相抗，却並未能完成一套新的經學來直接先秦與兩漢之舊傳統。直到南宋朱子，纔在中國經學史上掀起了絕大波瀾，上接古代傳統，而完成了一套新經學。朱子爲詩與易兩經作新注，更重要的是另定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來代替古代五經的地位。

論語一向爲兩漢以下中國社會人人所必讀。但漢代，論語只是一種小學教材，其地位比不上五經。孟子則列在子部儒家，不算是經。唐韓愈始提出孟子，認其直接周公孔子之傳統，宋人遂把孟子亦列爲經。

唐以前，儒家總把周公孔子並稱。宋以後，始改稱孔孟。這裏面有一極大的轉變。周公孔子並稱，則孔子之重要性，在政治方面者超過了其在教育方面者。今把孔子孟子並稱，則孔子之重要性，教育方面的始超過了政治方面的。

單就此一轉變言，不能不說宋儒認識孔子，已超過在漢唐儒之上。

至於大學、中庸，只是收載在小戴禮記中的兩篇。小戴禮記在漢代不認其是經，其中所收，大抵是戰國後期作品。大學既非曾子所傳，中庸亦非子思所作，此兩篇均應出在荀子之後。現在把此兩篇和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尊奉之爲人人必讀之書，那是朱子所大力提倡的。

朱子化畢生精力，爲四書作新注。朱子死後不到百年，南宋也亡了。但朱子學說却因此流傳到北方去。

元代蒙古政權統治中國八十年，朱子學說在當時社會上已有了廣偏深厚的基礎，政府亦把朱子四書定爲國家考試的新標準。明代承襲元制，從此直到清末，沒有改變。

佛學來中國，遠在魏晉，但直到唐代慧能以下，禪宗大行，佛學纔開始深入了中國社會之各階層。這因禪宗能把佛教教義簡化了，易於傳播。朱子四書，也便是中國經學傳統之簡化。朱子推尊大學，奉爲聖學之入門書，人人最先必讀，因大學把誠意正心和治國平天下連綿在一起。治國平天下是漢唐以來經學傳統之精神，正心誠意之學，則爲替代佛學之新教義。朱子說，中庸篇中所講，屬於天人性命最高玄理方面，應爲四書中最後始讀之書。如是可見四書內容在探討人生真理方面者，遠較五經爲更深入又是更突出了。

朱子把自己一套說法，從上推溯到北宋周濂溪、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四人，此又極像禪宗的歷代祖師傳統，用來增強自己學說的地位。

後代因把周張程朱五人並稱爲宋代理學之正宗，近人又稱之爲新儒家。實則理學完成爲一種新經學，則是朱子之功。經學、理學出於同一傳統，經學較偏在大羣的政治方面，理學較偏在私人心性修養方面，只此稍有不同而已。

朱子同時有陸九淵，明代有王守仁，稱爲陸王，與程朱相爭，陸王學則更簡化，更接近佛學中之禪宗氣味。

明亡後，學術重心又變。清儒想把兩宋以下的新經學重新回到兩漢以下的舊經學。換言之，是要把宋以下過分注重的私人心性修養方面的仍回到兩漢以下更所注重的政治方面去。這一個新運動的最先代表人應推顧炎武。

但清代由於異族政權之高壓，政治理想無可展布，學者們因厭惡此政權，而厭惡到政府的考試制度，於是轉成爲反宋學，反朱子，而清代經學乃逐漸變成爲只重校勘、訓詁、考據。